

著名作家冰
心老人70年前曾
写到：“成功的花，

中國名人得失談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

奋斗的泪泉，洒
遍了牺牲的血雨。”
四川文艺出版社

青春夢境里

主编 杨选民 许秀华



名人得失谈
杨选民 主编
许秀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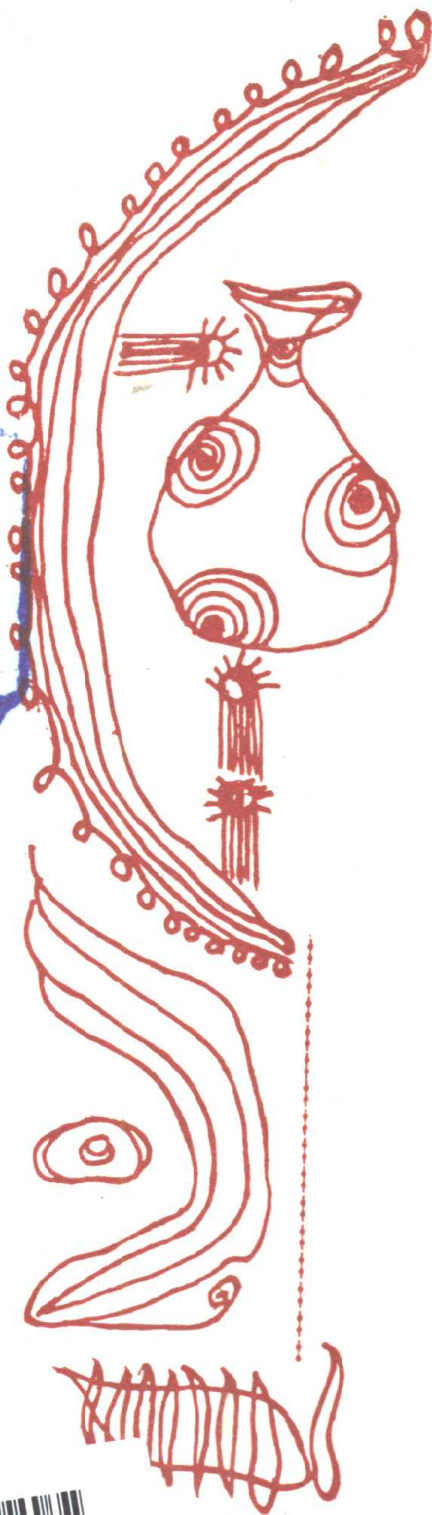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09502

书号 I267
Y33

青春梦境里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青春梦境里

中国名人得失谈(第一册) 定价 5.10 元

编 者 杨选民 许秀华 ISBN7—5411—0890—1/1.820

1992 年 8 月 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5,000 册

印张 9.25 插页 3 字数 208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内 容 简 介

13A172/05

人生百年事，得失寸心知。

经历了许多人世艰难、懂得了种种人情世故，我们还是不明白人生之旅中，你在哪里错过了机会？他又为什么四处碰壁？眼看命运已向我微笑，为何转眼间却风吹水流一场空！

青年朋友的思考与迷惘，启发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名人得失谈”丛书。全书约请 200 多位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书画家、摄影家、曲艺家、电影艺术家等，回忆他们一生的幸福与挫折、欢乐和痛苦、成功与失败，并根据这些完全真实的体验写出他们人生最得意的辉煌与最失意的遭遇……

名人是人不是神。他们从凡人到名人靠的是什么？读者从名人得失之谈的字里行间，会看到有志者九死不悔的追求，看到奋斗者朝气蓬勃的英姿，体会到中国知识分子几代人历经艰难、走向光明的人生之路。

本册收有著名作家萧乾、秦牧、端木蕻良，舞蹈家吴晓邦、贾作光、资华筠、莫德格玛，音乐家李光羲、贾世骏、尹升山、秋里、关牧村、邓玉华、陈钢，戏剧家于是之、李默然、方掬芬，电影艺术家汤晓丹、王铁成、向隽殊，书画家费新我、王孙乐、谢瑞阶等 55

人撰写的得失之谈。经历丰富,情感真挚,文笔朴实而动人。

人们都熟悉银幕上周总理的扮演者,却不知道王铁成的独儿子是个痴呆儿!马季、唐杰忠的相声逗得你捧腹大笑,但若不是罗瑞卿将军伯乐识马,唐杰忠也许一辈子也当不上笑星。大家都喜爱小提琴曲“梁祝”,作曲家陈钢却说:那是我初恋的墓志铭。儿童剧《马兰花》、《报童》打动了千千万万孩子的心,剧中活泼伶俐的主人公的扮演者,却是年已花甲的方奶奶。电影《卖花姑娘》、《永恒的爱情》、《流浪者》催人泪下,那动情的配音者向隽殊却一直在幕后……

编者的话

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之后，还总想知道别人的人生之路是怎样走过的。然而，芸芸众生的世界那么大，去问谁？又如何去请教？于是想出一个编书的法子。

头脑一热，边议论就边起草、散发征稿函。没几天，有人寄来了稿子，然而更多的则是来信问这书能出版吗？有出版经费吗？

冷静下来，琢磨半天，觉得只要书的内容好，经费自然可以得到解决，但是能否得到名人的支持为我们写稿呢？

于是，头脑又一热：一是北上，去名人荟萃的京城请教！因为，我们征稿的对象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征稿的内容是他们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得意的一件事和最失意的一次经历，包括生活琐事、社会褒贬、事业苦乐，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只要自己认为称得上之“最”的。

北方的冬天，屋外特别寒冷，可只要“闯”进别人的家里，便是热气、热情、热心肠——

著名作家萧乾说：“年轻人总想知道别人奋斗的经历，是少走人生弯路的好事！”

著名评论家冯牧说：“过去许多人们都不愿把自己的‘得失’公

开,你们现在来做这件事,我支持!”

著名舞蹈家吴晓邦、资华筠说:“搞舞蹈的艺术家也有得失,写出来非常有趣!”

著名歌唱家王昆说:“离开舞台来谈得失,更有意思。”

还有许许多多的名人说:“这是一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事
业,做了,了不得!”

……

二是从京城南下,到成都,去四川文艺出版社寻一条出书的路。因为他们有胆识,有气魄,有卓识远见……

很快,出版社把我们的丛书纳入出版选题计划。从而,更加增强了我们征稿、编辑的信心。

从此以后,一篇篇饱含激情的“得失谈”文稿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我们的案头。从作家、音乐家、舞蹈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摄影家、书画家、翻译家、曲艺家、杂技艺术家们的字里行间,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新旧社会几代人的身影,看到了他们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经历和生活,看到了他们不同的追求,各自的甘甜和辛酸、成功与失败,各自的得之最、失之最。还使我们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懂得了成功时“得之不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失败了“失之不忧”,总结经验教训把握转机,正确对待工作、学习、生活和恋爱、婚姻……

三年之后,当我们捧着汇集成册的书稿再次赴京,同名人们谈起请人为丛书写篇序言的时候,有人说:最好是自己作序,因为自己编书,对编书的目的最清楚,自己把这个思想和经过写出来,首先让读者看,就起码明白了书的主旨。还有人说:你们编的这一套丛书,花费的时间长、耗用的精力多,把编书过程中访问过的人,把他们的谈话和对书的看法写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

序，哪怕长一些。

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下决心一试。但还想请人题个书名，于是，大胆地去“闯”冰心老人的家门。

北京的春天暖洋洋。当我们把一部份书稿送给冰心老人过目时，她说：“书中的许多人我都认识。你们能把这么多名人的‘得失’汇集起来，不容易呀！这套丛书很好，很能启发人，也能给人以教益。我现在就给你们写书名！”

于是，我们的丛书有了书名。写到这里，似乎应搁笔了。但心情还不平静，因为值此丛书问世之时，书中有的名人也已经作古，这还得感谢他们生前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感谢他们留下了自己毕生的“得失”经验。

杨选民 许秀华

1991年12月

目 录

萧 乾	作 家	我的祸福观	1
秦 牧	作 家	战二魔	7
端木蕻良	作 家	琐事难忘	15
鲍 昌	作 家	我说我自己	18
吴晓邦	舞蹈家	“天马”得失	24
资华筠	舞蹈家	得意失意总年轻	29
贾作光	舞蹈家	我当上人民的舞人	36
莫德格玛	舞蹈家	我与《盅碗舞》	43
汤晓丹	电影家	喜悦自豪在心头	48
王铁成	电影家	一生最兴奋的时刻	53
颜一烟	电影家	从贵族小姐到特批党员	57
向隽殊	电影家	心系观众话得失	62
李默然	戏剧家	得失皆受益	68
于是之	戏剧家	痛苦学习及其它	73
方掬芬	戏剧家	一生得失总有情	79
夏 淳	戏剧家	甘当伯乐老亦乐	87
王 培	戏剧家	一“得”之喜	91

邵 华	戏剧家	愿做人生的“画师”.....	97
孙毓敏	戏剧家	我的母亲	101
程树榛	作 家	听从生活的安排	107
韩少华	作 家	机遇选择一念间	113
焦祖尧	作 家	井下一得	118
孔祥雨	作 家	第 49 次敲门.....	124
唐杰忠	曲艺家	将军与大尉	129
魏喜奎	曲艺家	以艺术为生命	133
蒋云仙	曲艺家	没划句号的得意事	139
常宝华	曲艺家	得失转化有机遇	143
李光羲	音乐家	“天堂”之所在	146
卞祖善	音乐家	我的梦	150
秋 里	音乐家	得与失留下的记忆	157
尹升山	音乐家	我的选择	162
曹火星	音乐家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66
陈 钢	音乐家	梁祝:我初恋的墓志铭.....	171
关牧村	音乐家	我的艺术道路	175
邓玉华	音乐家	于寒枝上育新蕾	179
贾世骏	音乐家	温故知新	183
谢瑞阶	书画家	走自己的路	188
费新我	书画家	痛失而后喜得	194
范韧庵	书画家	得失寸心知	196
王孙乐	书画家	末技雕虫愧未工	202
郝景岳	书画家	不以得喜 不以失忧	205
王 峰	杂技家	我的后半生	211
周云鹏	杂技家	我想有个家	217

张英杰	杂技家	我与北京的天桥	222
张 苛	舞蹈家	得而复失的“千手佛”	226
杨佩瑾	作 家	没有抛出的细石子	230
吴渝生	摄影家	唯有创造才是欢乐	236
柳成行	摄影家	一封信	241
汪景寿	曲艺家	访美之行话得失	248
刘时燕	曲艺家	在失中奋起 在得中奋进	252
解策励	音乐家	得之痛 失之愉	256
陆荫培	舞蹈理论家	酸甜苦辣话当年	259
高地安	舞蹈家	我那飞翔的梦	264
刘选标	杂技家	成功中的遗憾事	268
韦 彰	摄影家	美好的回忆	273
田 野	摄影家	永生难忘的镜头	277

我的祸福观



作家 萧乾

萧乾，男，1910年生，北京人，蒙古族。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任天津、上海、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兼旅行记者。1939年以后，任伦敦大学讲师，剑桥大学研究生，《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随军记者，复旦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副总编辑、《译文》编辑部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辑。是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常委，文化组副组长。现任中央文史馆馆长。1986年获挪威王国政府勋章。在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中，所著散文集《北京城杂忆》获荣誉奖。著有《萧乾选集》（四卷）、《这十年》、《红毛长谈》、《萧乾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等。译有[捷]雅·哈谢克《好兵帅克》、[挪威]易卜生《培尔·金特》[英]菲尔丁《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兰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加]《里柯克讽刺小品选》等。

我比许多人倒楣，又比另外许多人幸运。我一生受过罪，吃过苦头，可也有过好日子。我做过后来十分悔恨的事，也做过至今仍认为自己做对了的事。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曾有机缘在地球上一些角落闯荡过一阵子。我一生崎岖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终有所追求。人活到八十开外，通盘回顾一下，对人对己，也许不无裨益。

在广义上，我也是个记者。我一直把人生当作采访的对象和场地。尤其近几十年，人情世态的千变万化，倘若站在外面，是怎样也体会不到的。有些事现在谈起来好笑，当时身临其境，一点也不好笑。

1949年初，我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我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教授邀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他不但函约，三月间还亲自来到香港。他从大公报馆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九龙花墟道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接受大学的聘请。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我终身职位。

然而我在眷恋故土的本能——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北平的决定。

现在听说已拥有数千名中外工作人员的外文局，它的前身那时只有我们七员大将，其中领头的还只抽得出四分之一的时间。每天早晨我们这几个从香港来的就从西河沿一道骑车，去南河沿一个小四合院去办公，夜晚回到亚洲饭店睡觉。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

不久，我们搬到一个叫银丝沟的地方。这是一条与东长安

街仅隔着一道朱墙的窄巷，门前一条小溪，水大概是从金水桥下流过来的。住地是一幢小楼，我住在楼上。

建国后，机构正规化了，我们这个由香港迁来的刊物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在国会街新华社的大院子里办公，宿舍也由银丝沟迁到石驸马大街了。

“三反”后不久，我们搬到羊市大街了。房子很宽敞，宿舍和办公室在一起。这时，国际新闻局已改为外文出版社，人员也从几十增加到上百。语种多了，可英语仍是最忙的，因为除了本职工作，还得不断接受突击任务：替外交部翻译去联合国的讲稿，到中南海为亚澳职工大会搞同声翻译，经常得坐在打字机前，吧嗒吧嗒到午夜。

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尽管已经明确知悉自己不受信任，可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对工作从未放松丝毫。

那四、五年，我安不安心？这不能用一句话回答。自己会点外文，能派上用场，并且受到重视，心里总是惬意的。对我来说，那几年是个服水土的过程。至少我没怎么觉得过挫谁一头，因而心情大致是舒畅的。

然而我也确实心有所憾：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作，文学一直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尽管1949年7月领了一张作协会员证，由于得罪了权威，却觉得无形中已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了。我不完全满足于当个靠点外文吃饭的技术干部，内心存在一种想用自己的笔写点什么的愿望。

当时我们那伙人中间，有同样心境的，何止我一个！

195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时任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雪峰突然来访，说想调我到 he 主管的一个文艺团体，并征求我个人

的意见。

我兴奋得一夜也没阖眼。

归队了。回到自己的本行了。又能重新拿起笔来（而不是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写东西了。还能不兴奋吗！

我误以为调到文艺机构必然就是搞创作，原来是调我去参加一个文学翻译刊物的筹备工作。最初还是知足的，因为毕竟对象是国内读者了，再也不必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去琢磨洋人的心理。但不久就苦恼起来了，刊物有个呆在家里终审并不坐班的领导，是一位有名的硬译提倡者和实践家。由于我对他夫人的译稿做了比平时大一些的加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竟对我大发脾气。尽管事情最后得到公正的解决，然而这么一来，我不想呆下去了。

天时有阴有晴，人事也有个否极泰来。1955年春，我的编辑职务被解除了，正式通知我作专业创作人员。很快我就给上边打了报告：去一家煤矿体验生活三年，计划写一部以二十年代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没几天，天时变了，反胡风运动开始了。接着就是审干。我写了近五万字的一份自传，交了上去，一天，副秘书长给我看了有关我自己的政治结论。总之，历史是清白的。

从此，我突然升了值。这里邀我当顾问，那里请我当特约记者。升值的高潮是强行被调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走马上任后不久，就在反右斗争中成了活靶子。

患得患失是要不得的，然而什么是得，什么是失，要多年后才看得出来。例如，我是该刊三个副总编辑中唯一被打成右

派的，却又是唯一幸存至今的。其他两位均比我年轻许多，然而分别在 1966 和 1971 年被迫害致死。

三十几年来从个人遭际以及对周围的观察中，我形成一种祸福观，它也许颇合乎辩证法，但也很可能十分要不得。因为一提到祸福，总离不开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这个既不光采又往往难以避免的前提。尽管这个祸福观带有浓厚的阿 Q 色彩，多年来它对我却起过并且仍在起着镇定作用。它教我对人对事都不宜急躁地做出结论；既不可过于悲伤，也不要欢喜得忘了形。

从 1951 年忠诚老实学习到 1956 年审干，我由于出了校门就进《大公报》，在动乱年月里没到过重庆。在武汉也仅仅是过境，在同辈人中间（除了去老根据地的）经历算是简单的。因此，总是很顺利地过了关。反之，有位历史同样清白的朋友，只因解放前当过一任中学校长，并为此被迫领过一张印有青天白日的党证，1951 年在同一机关里就成为管制份子。可是到了 1957 年初夏，任凭怎么动员——事实上，也没动员到他头上——他连大气儿也没敢出。于是当我碰个头破血流时，他却安然无恙。

然而 1966 年的浩劫来临时，我的“五七年之祸”又变成了福。由于那九年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写了也无处发表——什么三家村、四家店，都同我无干系。于是，我只不过蹲在“牛棚”角落里，耷拉着脑袋当个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而已，戴红箍的连瞅也不瞅我一眼。渣滓也罢，垃圾也罢，当什么也比当斗争靶子要好过些。

回到文艺队伍，最初也以为是福，没想到几年后，却成为一场大祸。1957 年夏天以后，我曾多么悔恨没能安于当个技术干部，多么懊悔重新拿起那烫手的笔啊！我曾羡慕过挑担子的，

摆地摊的，推小车卖烤白薯的。那些年我常想：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也比握笔杆子保险！

1979年2月，我领到一纸证书，上面宣布我属错划的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损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最饱满的一段时光。要是没戴帽子，该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感谢之余，我心里却并不以为然。在鼓励说谎，甚至只许说谎的年月里，被夺去手中的笔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气管子被强行拆掉抬走，一面又违心地去歌颂大炼钢铁。一个握笔杆子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仅当只寒蝉好。更何况那年头，无论写什么，到了1966年以后都只能被“梁效”那位审判官抓作把柄呢！所以几年来在纽约、伦敦、奥斯陆、慕尼黑或新加坡，每当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语气问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时，我就回答说，那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并不是遁辞，而是肺腑之言！我一向不大会约束手中这支笔，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中间还经过一阵子神仙会，倘若不是头顶紧箍帽，我是决不可能只字不写的；而不论写了些什么，我的命运都不会好过那些可敬的“革命秀才”！